

巴西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巴西世界足球巨星贝利的自传新书——《贝利:足球之美》日前新鲜出炉,以详尽的细节与空前的坦率同大家分享他的经历以及人生中不可多得的智慧。“我将向大家阐述,在我这一生中,足球是如何帮助世界变得更好——将不同的群体融合起来,让像我这样出身于弱势群体的孩子有了人生目标与自豪。”“我总是对自己的幸运心怀谦卑和感激。感谢上苍,家人和那些一路上费心帮助过我的人;我还感谢足球这个最有魅力的运动,它将一个名叫“埃德森”的小男孩变成了‘贝利’。”现摘录其中精彩章节,以飨读者。

贝利 16 岁在桑托斯俱乐部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在这个俱乐部里,他一待就是 20 年。1958 年,17 岁的他赢得了第一个世界杯冠军,从而成了全世界获此殊荣的最年轻的人。1962 与 1970 年,他又两次获得世界冠军,从而成了全世界唯一一个 3 次夺得雷米特杯的球员。他同时还是职业生涯进球数最多的球员(在 1366 场比赛中打入 1283 个进球)。贝利曾被《时代》杂志评为“20 世纪 20 大重要人物”,被国际足联授予“球王”称号。

那一天,我们发现足球的真正影响力

“球进了!”我们笑着。我们大叫着。我们欢呼、雀跃。我们全家人都聚在自家的小房子里收听着比赛实况,就跟巴西全国的其他人家一样。300 英里外的里约热内卢,简称里约,位于巴西东南部,1960 年以前为巴西首都。现在是巴西第二大城市,又被称为巴西的第二首都,著名的国际大都市。

在热情喧嚣的家乡人民面前,强大的巴西正在世界杯决赛中对阵弱小的乌拉圭。下半场开始后 2 分钟,巴西前锋弗里卡摆脱

一名防守队员,送出一记锐利的低平球,越过守门员,打进了球网。巴西 1,乌拉圭 0。

这进球真漂亮——即便我们无法目睹,也是如此。我们这个小城镇上没有电视机,其实,巴西的第一个电视台就是在 1950 年世界杯时才建立的,但是只有在里约才能收看。所以,对我们而言,对大多数巴西人而言,就只能通过电台收听比赛了。我们家有一台大收音机,四方形的机身,圆形旋钮,还有 V 形的天线,就放在客厅的角落里。而现在我们正在它的旁边,疯狂地跳着、欢呼着、高叫着。

那时我 9 岁。但现在我仍记着那种感觉:欢快、自豪,我最爱的两个事物——足球和巴西——正与胜利结合在一起,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事了。我记得当时母亲舒适的微笑,还有父亲,我的偶像,那几年他一直因自己的足球梦破灭而忧虑不安,也突然焕发了青春,他拥抱着来家里听球赛的朋友,欢喜若狂。这种快乐,持续了 19 分钟。

当时的我,跟数百万巴西人一样,尚未学到人生的教训——在人生中,跟在球赛中一样,终场哨声响起之前,没有什么事是肯定的。啊,当时的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这个道理呢?我们都是年轻人,在一个年轻的国家,热爱着一个“年轻”的体育项目。我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1950 年 7 月 16 日,每个巴西人都记得这一天,它就像亲人离世一样永远铭刻在我们心头。而在此之前,很难想象有东西能将这个国家聚拢在一起。当时的巴西国民因各种因素而难以凝聚,巨大的国土面积即是其一。我们这个小镇——巴鲁(Baurú),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城市,在巴塔利亚河附近,东南距圣保罗 290 公里,1887 年成为城市。

位于圣保罗州的高原上,似乎与魅力非凡的海滨首都、本届世界杯决赛地点的里约有着天壤之别。里约意味着桑巴舞,热带气候和比基尼女郎——这是大多数外国人对巴西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

本书讲述德国 1939 年 9 月入侵波兰至日本 1941 年 12 月偷袭珍珠港之间的两年,罗斯福前后派遣了 5 位优秀特使前往欧洲,摄取情报,确立了苏美英三边关系,促成了美国参加二战的重大历史转折的故事。本报今起节选连载,全书由重庆出版社最新出版。

1.昏暗的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声

1939 年 9 月 1 日凌晨 2 点 50 分,白宫二楼一间灯光昏暗的屋里响起了电话铃声,将曾两次当选美国总统,现年 57 岁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其狭窄的铁床上唤醒。他用强壮的手臂撑起身来,无力的双腿耷拉在身后。他打开一盏灯,房间顿时展现出他所习以为常的杂乱:一把陈旧的摇椅,一张书桌,一架敦实的衣橱,墙上铺满了家庭照片和海军照片。一窝陶瓷的猪仔和一群雕刻的猴子盘踞在大理石壁炉台上。悬挂在门上的马尾让他想起在纽约哈德逊河谷度过的难忘童年。床头柜上挤满了多部电话,还堆满了书籍、阿司匹林、一包香烟、烟灰缸、祈祷文集,各种纸张和铅笔头。他拿起电话,来电的是美国驻法国大使威廉·C·布利特,转告了美国驻华沙大使的通报:“德国军团突破了波兰边境,纳粹德国空军正在对波兰城市狂轰滥炸,有史以来最残酷和规模最大的战争已经开启。”“知道了,比尔,它终于来了。”罗斯福说,“上帝保佑我们。”

随着消息的扩散,很快传到 5 位出类拔萃之辈的耳中。他们居住在北美各个地方。萨姆纳·韦尔斯,出身名门,美国副国务卿,也是总统的主要外交顾问,是第一个听到消息的人。韦尔斯才华横溢,一丝不苟,沉着冷静。一位中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将他喻为“对所有事情如冰水般冷静”。韦尔斯曾将塔列朗的著名语录签名赠送给这位年轻外交官:“无论如何,不要让情绪影响自己的工作。”罗斯福结束了和布利特的通话,马上给在奥克森希尔的韦尔斯打了电话。奥克森希尔是韦尔斯位于波托马克河畔占地 250 英亩(1518 亩)的豪华庄园。几小时后,副国务卿韦尔斯抵达国

务院,和他的上司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及其他高级官员一道参加了紧急会议。很快,他来到总统的床前,韦尔斯拘谨地坐在床头的椅子上,罗斯福则倚靠在枕头上,睡衣上套了一件蓝色披肩。

接下来两天里,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从最初的犹豫不决到恢复振作,并最终在 1939 年 9 月 3 日对德宣战,法国亦紧随其后对德宣战。韦尔斯一直给总统提供各种参考建议,在他国务院装潢漂亮的办公室里,办公室堆满了各种书籍,一把黑皮椅,一张透亮的红木桌子,角落的基座上安放了一位政治家的大理石半身塑像,韦尔斯协调处理了华盛顿对欧洲局势作出的反应,启动了拉美国家外长紧急会议。

如果说萨姆纳·韦尔斯处于决策的核心层,那比尤·多诺万则真正是远离政坛:他在加拿大育空区的提皮湖畔露营,那里距离最近的城镇也有 250 英里(约 400 公里)。“疯狂的比尔”是爱尔兰裔的美国战争英雄,纽约的律师,他肌肉强健。他是共和党人,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堂叔西奥多·罗斯福仿佛一个模子出来的。西奥多·罗斯福肯定会欣赏多诺万在加拿大育空区的行动:他和 3 位富裕的共和党人一道,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狩猎探险,其中有退休将军罗伯特·E·伍德,西尔斯公司和锐步公司总裁。他们有加拿大政府特别许可,为波士顿一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采集动物标本,他们也对此乐而不疲。在印第安人导游和行李车队的伴随下,骑马游弋在壮观的圣伊莱亚斯山脉和克卢恩湖畔,他们追捕猎杀野山羊、驼鹿、驯鹿和熊,捕捉褐色蝴蝶和北极鳟鱼。没有无线电收发报机,他们对欧洲恶化的局势浑然不知。多诺万从马背上跌下,差点就滚下悬崖一命呜呼。他一清醒过来,马上就一枪将 700 码远(约 640 米)的公羊打倒,然后又捕获了一头 9 英尺高(约 3 米)的灰熊,“这肯定是熊爷爷的爷爷了(高祖父)”,他的一个陪伴说。曾在法国接受了厨师培训的嘉客兄弟公司同时也是著名的当地旅行运动用品商和导游,精心准备了他们的餐饮。典型的野营晚餐包括开胃汤,各种丰富调味品烹制的烤羊羔或烤鸭、热的烤松饼、柠檬奶油馅饼、茶、苏格兰威士忌和雪茄。

的印象。而巴鲁,在比赛那天冷得吓人,母亲只好把厨房的炉子点着了——这是件很奢侈的事,但母亲觉得这样能提升客厅里的温度,不至于让前来听球赛的客人们冻死。

如果身在巴鲁都感觉距离里约是如此偏远,那么那些在亚马孙平原、广阔的潘塔纳尔湿地或东北部干旱的岩石地区的人们什么感觉就不难想象了。巴西的国土面积比美国本土要大一些,而在当时,人们感觉巴西要大得多。当时极其富有的人才买得起汽车,而全巴西都几乎找不到可供汽车行驶的道路。到家乡外面看一看——这只是一个只有少数幸运儿可能实现的梦想。我 15 岁才看到大海,更不用说见到身穿比基尼的女郎了。

事实上,地理因素只是造成巴西国民难以凝聚的因素之一。巴西,在某些方面来看是一个富饶的国度,黄金、石油、咖啡……资源丰富,而这个国家似乎同时具有两副面孔。里约的富翁和政客们住着巴黎风格的大厦,玩的是赛马,享受的是海滨度假。但在 1950 年巴西首次承办世界杯时,有一半的巴西人都吃不饱肚子,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识字。我跟弟弟妹妹就属于那些赤着脚走路的那一半巴西人。这种不公平源自我们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而我为止,我们家脱离奴隶身份才刚刚三代人。多年之后,在我退役之后,我见到了伟大的纳尔逊·曼德拉(1918—2013),1994—1999 年担任南非总统,被尊称为南非国父,著名反种族隔离人士,1993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所有我获准会面的人当中——教皇、总统、国王、好莱坞影星等等,他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曼德拉对我说:“贝利,在南非,我们有太多人种,有太多语言。而在巴西,你们的资源那么富饶,还只说一种语言,葡萄牙语。为什么你的国家还是不富强?你们国家为什么不团结?”当时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现在也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但在我这一生中,在

2.你可以用这些资金办实业

承德没想到保罗会讲中国话,他立刻想到了彼得罗先生,保罗的中国话很像彼得罗先生。“密斯特章,这次,我的叔父彼得罗让我专程到中国,把那笔账了结一下,这是叔父给你的信。”保罗打断了承德的话,递给我一封信。承德心里“咯噔”一下,他预感担心的事情来了。但是此时,他最想知道的是彼得罗先生的情况。承德打开信函,果然是彼得罗先生那种歪歪扭扭的中国字迹迹:亲爱的章,你好!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你通信了,我是非常想念你的,我的朋友。看来这辈子你我很难再见面了。我这辈子能够遇上你这样一个东方朋友,也是上帝对我的垂怜,章,你是一个好人,一个诚实的好人,现在我可以告诉你,那次你还给我的皮包里,有几份十分重要的文件,假如这些文件丢失了,我可能早就破产了,是你的诚实救了我。所以,这辈子我要帮你。但是现在,我不行了,再也帮不了你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你现在已经可以自立了。我留给你的那些生意,据说你做得很好,有了这些资金,你可以自己去办一些实业。章,我说过的话算数,那些利润,你好好发挥作用吧,这是你自己赚来的,拿着它,心里一点不要愧疚。我期待你的事业发展顺利。接到我的信,你与我的侄子保罗先生把账目清算一下,让保罗把 20 万两银两带回来。我说过,这批货我只要收回最初成本,你千万不要与我客气。这笔账清后,你就可以离开洋行做自己的事业去了。离开洋行吧,多保重。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商人的,我相信,因为你聪明,你诚实。章,我给你说实话吧,现在我的健康状况很是不好,哎——,年岁大了,该做的事我也做过了,以后,我将退出商界,准备回到乡下养病去了,那里是我的故乡,有我的亲人,但是我永远记得,在遥远的东方,我有一个忘年交的好朋友,他就是你,我的朋友!但愿上帝保佑你!

彼得罗
1877 年 1 月 17 日
承德把信看了两遍。看罢信函,他默默怔了一会,而后抬起头。“密斯特章,我这次只能在上海待 10 天,处理叔父在上海洋行的一些

这 73 年时间里,我目睹到了进步。我知道我们会不断进步,因为我看到了它的开始。

是的,人们可以咒骂 1950 年 7 月 16 日这一天,只要他们喜欢。我能理解,因为我也这样做过。但在我记忆中,这是巴西人的心第一次凝聚在了一起。那一天,整个国家的人都围聚在收音机旁,一起欢呼,一起痛苦……第一次,整个国家心气相投。那一天,我们开始发现足球真正的影响力。

我关于足球的最早的记忆,其实是街头临时拼凑的踢球游戏:低矮的砖房、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进球,欢呼,在冷冷的空气里大口喘气。我们一踢就是几个小时,直到踢得脚疼,太阳下山,母亲叫我们回家。没有高档的球具,没有昂贵的球衣,只有一个球——或像球的某样东西。而这都无法掩盖这一运动的魅力。

我对足球的一切知识,最早来自我的父亲——若昂·拉莫斯·多·纳西门托。跟几乎每个巴西人一样,人们都记不住他的本名,而都叫他绰号“唐丁霍”。父亲出生于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小镇,小镇的葡萄牙语本意为“大矿区”,因为在殖民时期这里曾发现了大量金矿。父亲与母亲塞莱斯特相识时,他仍在服兵役。他们结婚时母亲 15 岁,16 岁时就怀上了我。他们给我取名叫“埃德森”,为的是纪念托马斯·爱迪生,因为在我出生的 1940 年,电灯刚刚出现在我们的小镇上。父母对其深为震撼,就决定以他的名字给我取名。结果却是,他们漏掉了名字中的一个字母。爱迪生的英语为 Edison,而我的名字是 Edson,少了一个字母 i。

父亲热爱足球,他身高约 1.83 米,身材比一般巴西人都要强壮,并且球技非常好。他曾经在一场比赛中攻入 5 个头球。到现在为止,这仍是一项全国纪录。多年之后人们会夸张地说——贝利在巴西唯一没有打破的纪录就是他父亲保持的!父亲本能成为巴西足球史上的伟人之一,但他没有得到证明自己的机会。

事情,10 天后我要随大英不列颠女王号回英国。”保罗紧闭的嘴又张开了,承德打了个寒颤,他下意识点点头。“你,货物要抓紧出手,现在,欧战很快就要结束,欧洲的航路已经开通,有多家欧洲商行正在组织货源,用不了一个月,大批欧洲物资就要运抵上海口岸,这个,你明白?”保罗说。保罗看承德还是点头,于是又说:“密斯特章,这是我叔父彼得罗的意思。彼得罗要求我这次把全部货款带回欧洲。哦,上帝啊,这次你可发了大财,我叔父只要你付给他 20 万两银两,才 20 万银两啊,这批发这个价钱,就是在战前的欧洲,也是很难拿到手的。现在你算算,价格至少翻了一番。”脸颊被剃须刀刮得干干净净的保罗向章承德摊开双手,他耸了耸肩,夸张地摆出一副羡慕的样子。章承德心里一阵抽紧,现在,他将面临一个要命的难题:10 天,他怎么凑齐 20 万银两?

从温暖的船舱里出来,承德感到外面江风格外寒冷。上了舢板,他付给舢板夫一块银元,舢板夫惊喜地接过银元,嘴上连连说:“谢谢依先生!谢谢依先生!”欢天喜地把舢板摇得飞快。承德坐在舢板坐凳上,紧裹着马褂,脸上一副阴沉:假如,他没有用这笔钱办火柴厂,彼得罗先生给他做的这笔生意,别说 20 万银两,就是 30 万银两他一点难处都没有,可是现在,承德有些不敢想象了。看着在舢板前汤汤流过的江水,章承德思绪蔓延开去……

15 岁那年,因为家境贫困,承德离开宁波老家章家桥到上海学生意,3 年学徒期满,承德离开师傅店,在靠近德达码头的咸瓜街租了一间简易房子。一段时间,他做水产生意,做黄豆生意,可是都蚀本了。后来,还是同乡阿祥为他作保,让他租赁了一条小舢板,在黄浦江上靠触舢板载客摆渡过日子。就在那段时间,他遇上了彼得罗先生。对彼得罗先生,章承德永远怀着感激。那年,他从宁波乡下到上海谋生,遇到过不少外国人,几乎对所有的外国人,章承德都没有好印象,那些黄头发棕头发白头发的色目人种,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傲慢。那种蓝色、黄色甚至于灰色的眼珠子,让人永远猜不出他们心里在想点啥。

宁波商人

徐志明

